

日記

珍稀手札

日記手札

文獻資料叢刊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伯祥日記

王伯祥 著

王伯祥 著

王伯祥日記

第一冊

(19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伯祥日記 / 王伯祥著.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013 - 3887 - 0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伯祥(1890~1975)—日記 IV. ①K82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02865 號

責任編輯: 殷夢霞

裝幀設計: 敬人書籍設計工作室

呂敬人 + 呂旻

ISBN 978-7-5013-3887-0



9 787501 338870 >

書名 王伯祥日記(全四十四冊)

著者 王伯祥 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1619

版次 2011 年 8 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887 - 0

定價 26500.00 圓

前言

先父名鍾麒，字伯祥，五十歲後以字行。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於蘇州。

一九〇七年考入蘇州中西學堂，後入蘇州第一中學。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在蘇州甯直鎮縣立第五高等小學、廈門集美學校教書，在甯直任教期間，兼任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通訊研究員。在中學時期就與同學們從事學術文藝活動，甚為活躍。一九〇八年，與吳賓若、顧頡剛、葉聖陶先生等組織過詩社。一九〇九年又與頡剛、聖陶諸先生創辦了《學藝日刊》。

一九二〇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國文講師。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經胡適先生推薦就職於商務印書館，任史地部編輯。期間加入中國文學研究會。

一九三二年，伯祥先生到開明書店擔任編輯，由於他長於文翰筆墨，又請他兼辦經理室的工作，參與各種規

劃。不久，伯祥先生陞任經理室秘書，兼任了編審委員會召集人的職務。抗戰勝利後，任開明書店襄理。

一九四九年後，開明書店總管理處遷到北京，伯祥先生舉家於一九五〇年到京，任開明書店秘書長，在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的過程中，鼎力促成。

一九五二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伯祥先生辭去開明書店工作，即應鄭振鐸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期間加入中國史學會，被推為理事。

一九五三年隨組織機構的歸併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期間先後完成了多項研究工作。

一九五六年，伯祥先生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一九五九年後，先後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伯祥先生因肺炎醫治無效逝世，終年八十六歲。

二

文史學家伯祥先生治學嚴謹，著述豐富。對歷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文學流變，名物訓詁和版本目錄等學，造詣很深。

伯祥先生在訓詁學方面的造就始於負責編寫中學國文教材、教學參考書與活頁文選，這與他早年長期擔任

國文教師的工作有關。伯祥先生編寫的《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是極富特色的。具有選材新，文白兼收，注解全面、細緻，學術水平高，使用價值強，文字簡明、優美等特點，從這些注解中已經可以看出伯祥先生抗戰時編注《春秋左傳讀本》與解放後編注《史記選》那種厚積薄發的功力。

一九二四年，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先生將為中學生編寫一部歷史教材《中國史讀本》的任務交給顧頡剛先生，然而顧的祖母突然去世，他因悲痛而輟筆，大部分交由伯祥先生完成。此書問世，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幾年內竟狂印五十餘版次。然而，各種封殺的藉口滿天飛，如詭雲譎雨，一九二九年一份彈劾書最終捅到立法院，院長戴季陶下令查禁。伯祥先生出於義憤請人將上、中、下三冊合訂為一本，裝上硬皮封面，由葉聖陶題寫了書名《禁本本國史》，燙金鑄上書脊，落款「伯祥自珍」。為了避免嫌疑，書內無版權頁，無序無跋，無目錄，而前後各裝入十個空白頁，寓意被「開天窗」，以示抗爭。

一九三八年春，伯祥先生開始選注《左傳》，耗時兩年，完成《春秋左傳讀本》。該書的編選，以重要史事的本末完整為原則，同時也考慮到文學的價值。注釋十分詳盡，生僻的詞語、句子都逐字逐句注釋，再整句串講，全書注釋達八千三百餘條，一九五七年又用原紙型重印。

《史記選》是伯祥先生五十年代的力作。伯祥先生先花了近兩年的時間進行版本校勘，然後進行校釋，包括校訂文字異同與注釋兩個內容。由於選注功夫扎實，該書經住了時間的考驗。自出版之日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了，多次再版重印，仍暢銷不衰。《史記選》先後被納入《世界文庫》、《大學生必讀》叢書，可見此書非同凡響。

的學術地位。

伯祥先生專於中國史地，又精通版本學，一九三四年大膽提出了出版《二十五史》的計劃，并組織了『二十五史刊行會』。《二十五史》與同類史書的不同之處在於以下幾點：

其一，力主採用《二十四史》有考證的殿本縮印，因為殿本，更有實用價值。殿本無考證的《明史》，則把王頌蔚的《明史考證攷逸》拆散開來，附在每篇後面。

其二，每一史後面編了一個參考書目，其內容極為豐富。

其三，將汪輝祖的《史姓韻編》改編成《人名索引》，并將未列入《史姓韻編》裏的少數民族和外國傳中的人名也收入其中。

其四，主張把近人柯紹忞編修的《新元史》收編進來。為此曾向北洋政府當局據理力爭，多次交涉，才使之得到『正史』的名分。

基於上述貢獻，鄭振鐸先生稱頌《二十五史》是一部『扛鼎之作』。

伯祥先生更重要的貢獻還在於編了《二十五史補編》。在開明書店出版《二十五史》時，伯祥先生就深感存有缺憾。為此，收集了原書中屬於補闕的、校正脫誤的、考證的、注釋的、繪圖作說明的、研究的等六類文獻。這些文獻散見在各種叢書中，當時《叢書子目索引》還未問世，要從大量的叢書中去找出這些文獻是極其費力的。由於他對目錄學很有研究，熟悉各種叢書，所以能很快從叢書中將有關文獻輯出。在編刊《二十五史補編》時，

伯祥先生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閱讀、注釋、考訂、校勘了八千八百多頁，一千四百多萬字書稿。

伯祥先生由周振甫、盧芷芬兩位協助，還搜求到未刊本約一百七十多種，加以刊行。他又將收集到的信息編成一個補編目錄，進一步四處訪求，加以增訂，後來竟超過二百四十多種。

顧頡剛先生在《補編序》中稱這部書是「史學界中一絕大快舉，使我們眼福可誇耀於前人者，開明書店之力也」。茅盾先生說，「葉聖陶先生創作《倪煥之》，是文學界的扛鼎之作，那末顧頡剛先生的編《古史辨》，應該也可以說是疑古學上的扛鼎之作。王先生的編定《二十五史補編》，是史學界的扛鼎之作」。

伯祥先生在編上述二書的同時，還指導和協同盧芷芬、周振甫兩位編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為查檢中國歷史人物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編寫人名索引的同時，伯祥先生又著手編寫《二十五史地名索引》。然而就在付印的過程中，存放在梧州路開明印刷廠的紙型與《二十五史》鋅版一起被日寇戰火全部焚燬，令人扼腕。

在目錄學方面，伯祥先生的貢獻當推《書目答問補正（批注本）》。早在「一·二八」大火之後，伯祥先生就開始在《書目答問》一書的基礎上做增補工作，添加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所學，把清末張之洞編撰、范希曾補正的一本推薦性的書目，變成了一本知見性的書目。北京大學朱天俊教授在此書的序中這樣寫到：「翻開影印本，處處可見先生用娟秀而流暢的行書寫成眉批、校注題記、跋語文字，宛若繁星灑落在影印本的字裏行間，朱墨交替，瀟灑自如，於細微處見精神，伯祥先生讀書之認真，做學問之刻苦，令人崇敬」。

伯祥先生不僅在鴻篇巨製上成就卓著，而且還寫了《三國史略》、《鄭成功》、《太平天國革命史》、《中日戰

爭》等一些專著，借歷史教訓諷喻時政，他還擅長寫作時評雜文，抨擊社會弊端。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前後，與鄭振鐸先生等創辦《公理日報》，抗議英帝國主義暴行。

抗戰勝利後，在《周報》、《民主》等刊物上寫稿，《周報》被迫停刊時，在終刊號上『我們控訴』欄裏，寫了一篇題為《且等翻過這一頁歷史》的抗議文章，表示對舊政權的唾棄。

解放後，除了《史記選》之外，還撰寫了《增訂李太白年譜》等著作，參加了《唐詩選》的選注工作，並應中華書局的約請，完成了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選注、編寫、斷句工作。

伯祥先生一生愛書，治學勤勉。晚年目力衰退，致一目失明。『文革』期間，鬱積成疾，曾大病一場，病後體力大不如前，只能在室內扶牆摸壁地走動，但仍堅持讀書、寫字，直至病危。晚年，伯祥先生完成絕作《舊學辨》，以一生心血怒斥了踐踏中國文化的劣行，捍衛了中國文化的精髓。

這些學術活動在日記中都可以得到查證。

三

伯祥先生一生為人處事低調，却得到朋友、同事的尊崇，生前與許多文人學者，如葉聖陶、俞平伯、顧頡剛、張元善、鄭振鐸、周予同、章錫琛、夏丏尊、吳覺農、宋雲彬、顧均正、徐調孚、陳乃乾、唐弢、林漢達、啓功等先生都有學術交流、書信往來、詩詞應答和相互探訪。

伯祥先生與葉聖陶先生自幼同學共事，是過從最密、相處最久的朋友，有七十年的情誼，兩家幾代人都很熟悉，是文壇的一段佳話。抗戰期間，葉家避難入川，先後滯留於重慶、樂山、成都等地。八年間，葉先生和上海親友們的通信往來都由伯祥先生中轉。十年動亂期間，葉聖陶先生受到衝擊，他在《東歸江行日記》小記裏寫道『在那淒淒惶惶的歲月裏，還保持往來的只剩下王伯祥先生一人。伯祥先生腿腳不如我。我去看他的回數多，搭公共汽車四站路，每月兩三回。』

伯祥先生與鄭振鐸先生的忘年之交持續四十多年之久，非同一般。二人互稱對方爲『伯翁』和『鐸兄』。在白色恐怖年代鄭振鐸先生曾將遺囑存放在伯祥先生家裏，隨時準備赴難。振鐸先生在創辦《周報》期間，經常到上海霞飛坊三十五號王家，遣王家子女邀請同住在一條弄堂中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過來密談要事。一九五八年鄭振鐸出訪途中飛機在阿拉木圖失事，伯祥先生聞訊聲淚俱下，寫了建國以後唯一的一篇白話文《悼念鐸兄》。

這些往事在日記中都記錄在案。

四

伯祥先生自幼記日記，幾十年如一日。停筆的只有一九四一年日寇入侵上海後的五十天，以及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後漫長的六年半時間。一九七三年大病初愈後恢復日記，直至去世前半年，因目力所限不得不擱筆。

一九二四年之前的日記，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大難中已被焚燬。現今保留下來的共有一百四十一冊又三本附冊。一九三八年前，均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洋裝本日記冊記寫，一九三八年後改用宣紙大開本綫裝，封面封底均用磁青紙鋪陳。以後則改用毛邊紙，封面、封底用紙也不統一。從一九六一年起，改將日記記在活頁紙上，積多了（約三、四個月不等）自行用紙捻串訂成冊。

早年日記以年為卷，以後則以不同的歷史時代劃分。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日破例行新卷。其中有數卷（冊）統稱一名的，表達一個歷史時期，有以住地書房命名的，如『蘇亭日記』、『容堂日記』、『巽齋日記』，有以行踪命名的，如『燕居日記』、『旅京日記』、『南歸日記』、『青島休養日記』；更有以國家大的事變命名的，如一九四五年的『貞元交會錄』、一九四九年的『更新日記』、『文革』期間以天干地支命名。伯祥先生每每變更日記署稱，日記起迄遵照何種曆法，與他對當時世道之觀點明確相合。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美之間開戰，日本兵沖進了所謂『孤島』。鑒於形勢的突變，伯祥先生中斷了日記五十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當他重新落筆時，卷名已改署『巽齋日記』。巽為八卦之一，古時『巽』與『遜』字相通，故含意謙遜之外，又延伸有『怯懦』之意。定名為『巽齋』，既有對民族屈辱的自嘲，又有自勉之意。一旦日本投降，日記的卷名馬上更改為『貞元交會錄』。而國統晚期與『文革』期間以傳統干支紀年法命名，也是他的一種心情寫照。

伯祥先生日記的內容極其豐富，涉及家國大事、社會生活、學術活動、親朋往來、家庭細事等等。日記中尤

以抗日戰爭時期最爲詳盡，當年伯祥先生困守『上海孤島』，所記錄下的種種事項，是研究這段歷史的珍貴資料。

日記中大量記錄了伯祥先生商務十年，開明二十年的工作經歷和切身感受，也是研究這段文化史和出版史的第一手資料。當年伯祥先生還爲開明書店建立過工作日記，可惜這一珍貴的歷史資料，在十年動亂中散失無存。

日記中對朋友間的迎來送往也做了記錄，這些文人學者們的言談舉止，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可以從日記中得到考證。

伯祥先生的日記詳略不等，長則一日可記數千言，短則寥寥幾句。這雖與他的工作生活忙閑有關，更受時局變化的影響。如在『文革』期間，伯祥先生日記只限生活起居，不涉政治事件，甚至連老友造訪都一律不見諸筆墨，這並非杞人憂天。

文如其人，日記尤甚。伯祥先生一生喜怒哀樂於色，愛憎溢於言表的性格，從日記的字裏行間均可感受到，至於嚴謹治學的態度，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可從數十年如一日的筆端流露出來。這百餘冊日記，書寫之精美，行款之得當，筆墨之流利，也堪稱書法之佳作。

伯祥先生的日記除燬於『一·二八』戰火的部分，尚有三段缺失。前兩段爲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九日、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均爲與葉聖陶先生結伴南游所記的小冊。後一段爲一九五九

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二日參加全國政協視察河南時所記，記在活頁本上。除這三個片段已散失，其餘裝訂成冊的，則未失一頁，未漏一字，未著一處刪改。現將這一百四十餘冊日記全文悉數按原貌影印出版，這是因為我們深信伯祥先生其人其文經受得起歷史的拷問與後人的評價。這既是對伯祥先生本人的尊重，也足證當今文壇的開放。

今年恰逢伯祥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王伯祥先生日記》得以出版，應可告慰先父的在天之靈，在此謹向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以及參與該書編輯出版工作的所有同志表示誠摯的謝意。

王潤華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於北京芙蓉居



◆1912年伯祥先生與葉聖陶(右二)、顧頡剛(左二)等人攝於蘇州。



◆1919年，於蘇州角直鎮吳縣第五高等小學任教期間。
背景系校園內教工宿舍，所抱孩子為四女清華。



◆20世紀20年代，移居上海。



◆40 周歲時，攜夫人秦珏人攝於上海。



◆抗戰爆發，為避戰亂從上海虹口區遷至法租界。此為開始蓄鬚時的留影。



◆20 世紀 20 年代末，與鄭振鐸（中）、胡愈之（左）攝於滬南半淞園。



◆抗戰勝利後，1947 年秋在上海霞飛坊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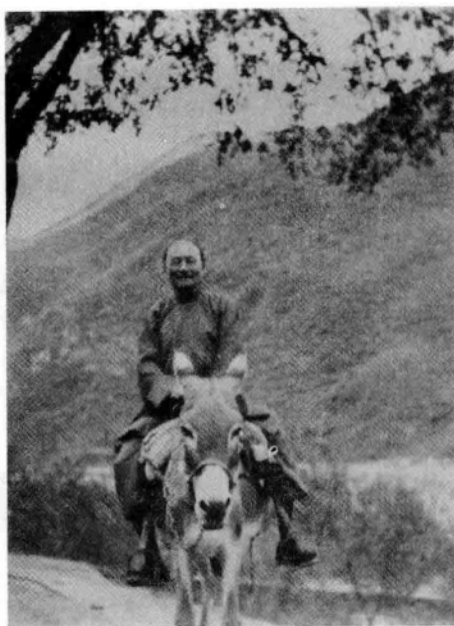
◆1947 年與夫人在上海霞飛坊天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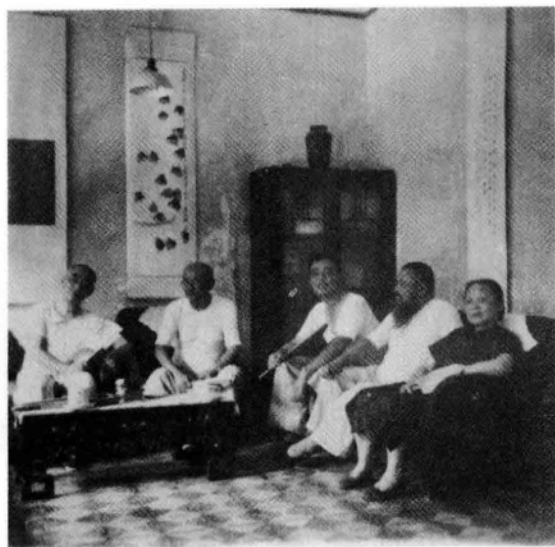
◆1947 年秋，伯祥夫婦與部分兒女攝於上海（不含後排左一）



◆1951年，遷居北京小雅寶胡同，攝於寓所客廳。



◆1951年9月，與開明書店同仁遊北京八達嶺，攝於上山途中。



◆1952年春，與葉聖陶(左一)、胡墨林(右一)、丁晚先(右二)、盧芷芬(中)攝於北京。



◆20世紀50年代，與呂叔湘(左四)、范洗人(右三)、盧芷芬(左二)、葉至善(左三)等在京合影。



◆20 世紀 50 年代初，由六女漢華、女婿盧芷芬陪同登泰山。



◆20 世紀 50 年代中，飄然漫步北京陶然亭。



◆20 世紀 50 年代中，與俞平伯(中)等遊覽十三陵。



◆1963 年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視察團，攝於四川三峽。同行者為雷潔瓊(左二)、屈武(右二)、張明養(左一)、李蒸(右一)等人。